

# 《补 全宋诗 沈遘诗六十四首》质疑

周小山

摘要：林阳华先生所补全宋诗沈遘诗64首并非沈遘诗作，而是东溪先生高登作品。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，既有研究者主观方面的，也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有关。

关键词：补《全宋诗》；沈遘诗；质疑

中图分类号：K877.4

文献标识码：A

文章编号：1009-1017(2012)02-0059-02

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》2011年第3期发表了林阳华先生《补 全宋诗 沈遘诗六十四首》一文（以下简称“林文”），作者发现了未被《全宋诗》、《全宋诗 订补》以及其它相关学术成果收录的沈遘诗64首。此文首先对这一成果的来源——今人徐敏霞校点的《古今岁时杂咏》（下文简称“《杂咏》”）作简单介绍，指出该校点本以《四库》本为底本，参校明抄本，而“明抄本较之《四库》本的优点主要在于，将未署上作者的诗篇标明了作者姓名”，所辑“沈遘诗”的作者即是校点本据明抄本所补。接下来利用一定的篇幅，讨论这64首诗与沈遘《西溪文集》的关系，认为这64首诗之所以未被《西溪文集》收录，很可能是由于靖康之变造成的流失所致，南宋初高布在合刻《沈氏三先生文集》时，其中的《西溪文集》“概已不见此六十四首诗”，后被《杂咏》所收，并得以保存。但《全宋诗》与《全宋诗 订补》两书，并未以《杂咏》为补辑来源，从而漏收，故依《杂咏》以大量篇幅依次列举了沈遘的64首诗，补充《全宋诗》沈遘诗收录之缺。

在《全宋诗》订补成果汗牛充栋的情况下，还能有如此可观的成果，自然是可喜的。然而，这份成果尚有诸多可疑之处。上述所言署名“沈遘”的诗，在北大藏道光本、北大藏清初抄本、翁方纲《四库提要稿》所见本、汪鱼亭抄本等均署“东溪先生”，而非“沈遘”。

收稿日期：2011-12-20

作者简介：周小山（1982-），河北唐山人，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，主要从事唐宋文学及文献研究。

上述系简括林文而成，具体论述不作繁复转述，详参原文。“道光本”的提法并不准确，但为了与下文所引包菊香女士相关文章的说法保持统一，避免淆乱，姑且从之。另有专文涉及对此本的深入论述。

现藏南京图书馆，有丁丙识语。

笔者未见此清初抄本，署名“东溪先生”乃转述包菊香女士之说。[清]翁方纲纂、吴格整理《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》“《岁时杂咏》”条所作札记摘录了一些诗歌的作者，其中有“东溪先生”。（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，2005年，

“沈遘”有《西溪文集》，故“东溪先生”亦非沈遘之称。通过《杂咏》现存几个版本的初步考察可知，校点本《杂咏》之署名沈遘，是承袭了底本的讹误所致。

《杂咏》一书现存多为抄本，各本之间的关系尚不十分清楚，但大致可分为两类：第一类宋诗部分多数署字号、官爵（个别署姓名），如“东坡”、“黄鲁直”、“温公”、“黄门”等，只有少数署姓名，如“晏殊”、“魏野”。另一类宋诗部分则多数署姓名，如“苏轼”、“黄庭坚”、“司马光”、“苏辙”等，只有个别不能确定姓名的才署别号，如“豹林先生”。我们可以断定，前者更接近原本面貌，后者则是删省前一类字号、官爵的结果，理由有二：一、蒲积中为宋人，对本朝人甚至是当代人表示恭敬，故称字号、官爵，符合其身份。而有些称呼后来已经不容易识别了，如“豹林先生”（种放）、“东溪先生”、“白云先生”、“范致政”、“林学士”、“樊著作”等，非编选者不能出之，足以说明这类版本的原始性。二、后一类版本保留对前一类版本改写未尽的痕迹，如校点本据明抄本补《次韵定国九日同送莘老黄门》诗，未署作者，而道光本“黄门”为作者，此诗也确为苏辙之作，作《次韵王巩九日同送刘莘老》，即是后一类版本误以“黄门”为诗题之一部分而漏改，亦是后一类版本源于前一类之铁证。后一类版本在省改作者时，因为态度不够严谨，时有错误产生，而将“东溪先生”误改为“沈遘”即是最严重的情况。

那么“东溪先生”为何人？包菊香女士在《古今岁时杂咏 版本及其文献价值》（上、下）一文（以下

第1068-1069页）可推知，校点本《杂咏》等之“沈遘”诗，翁方纲所见之本亦作“东溪先生”。

如上述北大藏道光本、北大藏清初抄本、翁方纲《四库提要稿》所见本、汪鱼亭抄本等。

如四库本、校点本用作参校本的明抄本（据校点本校勘记）等。

[宋]宋绶、蒲积中编，徐敏霞点校《古今岁时杂咏》卷36，辽宁教育出版社，1998年，第415页。

[宋]苏辙著，曾枣庄、马德富校点《栞城集》卷7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年，第163页。

简称“包文”)指出,此“东溪先生”为高登,并将《全宋诗》未收的62首诗收入其名下。虽然包文收录的个别诗作尚有可斟酌之处,判定“东溪先生”为高登的理由也偏于简单,但综合考察《杂咏》一书,断“东溪先生”为“高登”大致是没有问题的。

首先,就现有文献看,在《杂咏》成书前,有《东溪集》者三人,分别为“黄亢”、“释祖可”和“高登”,均有称为“东溪先生”的可能。而三人之中,高登与蒲积中同时而略早,有节行,亦颇有声望。卒后四十年,朱熹记其事迹云:“靖康间游太学,与陈公少阳伏阙拜疏,以诛六贼、留种李为请,用事者欲兵之,不为动也。绍兴初,召至政事堂,又与宰相秦桧论不合,去为静江府古县令,有异政……被檄试进士潮州,使诸生论直言不闻之可畏,策闽浙水沴之所由,而遂投檄以归。桧闻大怒,夺官徙容州。公学博行高,议论慷慨,口讲指画,终日滚滚,无非忠臣孝子之言,舍生取义之意,闻者凜然,魄动神竦。其在古县,学者已争归之,至是,其徒又益盛。”朱熹又有《乞褒录高登状》及两篇《谒高东溪祠文》,陈淳也有《东溪先生》祝文一篇,均可见后人对其人品的推重。就具体历史语境而言,蒲积中所称之“东溪先生”是这位时代接近、名望颇重的高登的可能性更大。

另外,从《杂咏》中高登诗的数量与位置,亦可窥些许消息。从数量看,在《杂咏》20余卷的“今诗”部分,作为后世并无诗名的“东溪先生”,其诗分布多

达16卷,凡60首左右,数量排在第7位,仅次于苏轼、梅尧臣、张耒、晏殊、宋祁、司马光等各位大诗人之后。对这样的现象,大概只能归之于其人与作者时代近、声望高了。从位置来看,《杂咏》中诗作排列次序较为杂乱,而“东溪先生”诗所在的16卷中,却有8卷位于卷末,似乎也是该作者时代晚近的一种提示。

总之,《杂咏》中这位“东溪先生”绝非沈邁,大致可推断为高登。

这样,林先生所辑这六十四首“沈邁诗”,均属误辑,其余关于这些诗与《西溪文集》的关系,也就成了无根之谈。造成上述失误的原因,笔者认为,大致有以下两方面:

一、轻信他人,调查不足。林先生过分相信、依赖于校点本《杂咏》,缺乏必要的谨慎与警惕,忽略了亲自调查文献的工作。如林文中屡次提及“明抄本”,均取自于校点本《杂咏》,实则徐女士所言国家图书馆之明抄本的说法是不太准确的,因为仅国家图书馆所藏明抄本就有三种(含一种残本),校点本根据的“明抄本”是哪一种,未作任何说明。而林先生不作调查,即随之称为“明抄本”,难免有人云亦云之嫌,也失去了发现整理本《杂咏》自身缺陷的机会。六十四首诗中,收入一首高登诗,一首古歌谣,亦是核检不周所致,尤其是前一首,如若发现,或可启发作者全新的思考,一个重要信息就这样失之眉睫。另外,对前人成果的考察上,未见包文,从而使上述失误最终“出炉”,也是调查不足的结果。

二、思虑不周,推论过远。林先生这个成果疑窦颇多,如明知南宋初高布受沈邁之孙沈晦委托刊刻《吴兴三沈集》(含《西溪文集》),也知道沈晦所见到的《西溪文集》当较为真实可靠,而沈邁子孙都未得见的六十四首诗,却存于同时人蒲积中的诗歌选本之中,岂可不疑?林先生对此毫无警觉,仍进行有关这六十四首诗缺失的原因以及存在形式(另成一书或自成一卷)的种种推论,皆游离太远。

纵然林文的疏失有其自身的原因,但客观条件的限制也是不容忽视的,从各种古籍目录来看,《杂咏》多以抄本传世,主要藏于北京、上海等各大图书馆,阅览颇为不便,无从利用善本,仅依通行之校点本撰成此文,也是情有可原的。因此,林先生失误与校点本《杂咏》本身的问题有很大的关系。再如,《全宋诗》订补的成果分布极广,以个人之力难免有遗漏,而包文发表《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》流布不广,也是造成林先生未见包文的原因之一。凡此种种,皆情非得已,不可苛责。

(责任编辑:刘兵)

林文与包文所录“沈邁”(高登)诗,大致相同,包文较之林文,少两篇:一为《和人上元回文》诗,包文发现此诗已入《全宋诗》“高登”名下,故不录。二为《八月二日》诗:“高田种小麦,终久不成穗。男儿在他乡,那得不憔悴。”此诗见《古今岁时杂咏》卷四十五,四库本不题作者,整理本据明抄本补署“沈邁”,故林文收录,道光本亦明确题作“东溪先生”,包文未收,亦未作说明。此诗非宋人诗,而是一首古歌谣,见于《齐民要术》卷二(〔后魏〕贾思勰著、缪启愉校释《齐民要术校释》第二版,中国农业出版社,1998年,第127页)。从诗歌本身看,诗、题不符,亦颇为蹊跷,此为林文承袭编选者之误。包文断“东溪先生当为高登”,但未说明直接理由,然后以《杂咏》所收“东溪先生”之《和人上元回文》诗被《全宋诗》据清朱象贤《回文类聚续编》卷8收入“高登”名下为证。此诗无论在《回文类聚续编》中如何署名,在高登《东溪集》早已散佚的情况下,必来源于《杂咏》,因此《全宋诗》或《回文类聚续编》将此诗系于“高登”名下,只能说这是今人或清人对《杂咏》中“东溪先生”的一种判断,对这样的判断应保持必要的警惕。

高登卒于1148年,而蒲积中《杂咏序》作于1147年,虽不知此时《东溪集》是否成书,但诗作成书前即以各种方式(比如小集的形式)流传,故亦有选入的可能。朱熹《漳州州学东溪先生高公祠记》,〔宋〕朱熹著,戴扬本、曾抗美点校《朱子全书·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79,上海古籍出版社、安徽教育出版社,2002年,第3784页。《朱子全书·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19,第882-883页。《朱子全书·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86,第4046-4047页。〔宋〕陈淳撰《北溪大全集》卷49,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据李裕民先生《四库提要订误》(增订本)“《古今岁时杂咏》”条,中华书局,2005年,第419页。

《全宋诗》在利用《杂咏》中避免了很多错误,包女士相关成果的产生,都离不开北大自藏道光本《杂咏》的便利条件。

对于校点本《杂咏》整理中存在的问题,笔者另有专文讨论,兹不赘言。